解放军在成都举行盛大入城式

陈 宇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12月29日，解放军先遣部队乘车进入成都市区。市民们争先恐后地赶来迎接，并争相询问“那个手提两把菜刀的贺龙在哪里？”解放军战士告诉市民：“贺龙司令员明天进城。”于是，成都市民忙碌起来，纷纷写标语、扎彩灯、学新歌……并兴奋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12月30日，大家早早走上街头，准备一睹人民子弟兵入城的风采。

解放军队伍进入成都市内繁华街道

赶制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底，在川西邛崃山脉下大邑县境一家农舍内，中共川西边地下党领导下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指挥员们从广播中收听到发自北京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全旗为红色，五星为黄色，杆套为白色，五星位置在旗之左上角，全旗长宽为三与二之比(如长三尺，则宽为二尺)。以全旗四分之一地位，大星居该地位之偏左，四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国旗作法：一、五星位置确定法：以全旗四等分之一的左角长方块……第二第四两星在左十二格右三格，上四格下四格之间。二、五星大小确定法……”

收听广播完毕，游击队员们心情格外激动，他们立即找布料制作五星红旗，还立即印刷了一期《火炬报》，上面详细记录了五星红旗的制作方法。

随后，游击队领导人李维实等秘密进入成都，把载有五星红旗图样和制作说明的《火炬报》交给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留蓉工作部负责人吕振修等。留蓉工作部迅速行动起来，委派地下党员余如南到暑袜街“旗帜衣帽军装社”找到有内部关系的理事，组织人员赶制5000面五星红旗。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在成都的另一组织——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工委)，也得到了五星红旗的制作方法，并开始了紧张的画样制作。“临工委”负责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已经被“临工委”策反的国民党“成都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乔曾希在市内物色人选制作五星红旗。乔曾希接到任务后，立刻找到进步青年傅学勤，并进行了推荐。

在乔曾希的安排下，“临工委”负责人胡春浦见到了傅学勤，将五星红旗的样式和制作说明交给了他。在“民众自卫队”证章的掩护下，傅学勤携带图样飞奔至姨夫刘敦厚设在暑袜北二街的“泰来祥”旗帜商店。刘敦厚听后马上答应，决定成批制作，并立即安排傅学勤到楼上设计制作旗样。傅学勤一个人整日吃住都在楼上，开始设计五星红旗的样式。晚上，刘敦厚和六七个本店店员、邻居朋友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的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黄漆把五星喷在红布上；另一种是用黄布剪成五星后，再用缝纫机把五星缝在红布上，为了两面都现出黄五星，再把五星背面的红布剪去。在大家的努力下，“泰来祥”库存的红布很快用完，上街采购却发现红布“异常难买”。大家来不及细想，就拿白布染成红布继续制作。经过数夜奋战，“泰来祥”旗帜商店终于在成都解放前夕制作出5000余面五星红旗。

12月30日清晨，成都市民高举五星红旗，走上街头。此外，各家各户的房檐下还挂满了红灯笼，门上、墙上张贴着“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等彩纸标语。欢庆的人流穿梭往来，挤满大街小巷。因怕战祸而关门的商店，早已布置一新，全部开门营业。总府街、春熙路一带许多书摊一大早就开始出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市民们争相购买。

盛大的入城式

上午8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的领导人贺龙等人和中共成都市地下党组织领导、市民代表欢聚一堂，共商入城式具体事宜。

9时整，随着贺龙的一声令下，入城式在震天的军乐声、口号声、鞭炮锣鼓声中隆重开始。中共川西边临委会留蓉工作部的地下工作者为前导，高举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画像，走在队伍的前列。此外，前往参加欢迎仪式的起义将领、中共成都地下工作者及民主人士，也分乘7辆吉普车陪同解放军一起向市区进发。解放军将领所乘的13辆吉普车和小轿车随后跟进。当天，贺龙穿着和解放军战士同样的棉军装，外披一件皮大衣，乘车进入成都，一路上向着欢呼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眉宇间透露出胜利的喜悦。

“看清楚了吗，那个就是贺龙!”一些起义将领向身边的市民介绍说。

突然有个人大声喊道：“怎么没有看到他手中的两把菜刀?哎，怪了！他手中怎么是一把榔头?”市民们随着此人的喊声好奇地望去——这才发现，原来此人眼神不好，竟把贺龙手里的大烟斗看成了榔头。

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部队，是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兵团(1949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该部由第一野战军划归第二野战军建制)第六十军。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成都市郊区经过几天的休整准备后，人人容光焕发，在入城式总指挥张祖谅军长的带领下，迈着矫健的步伐昂首阔步向成都市区开进。

成都市民看到：解放军入城队伍中的仪仗队高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紧随其后的是20面红旗组成的方队。红旗方队之后是13辆大卡车：第一辆车上高悬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二辆车上载的是军乐队，高奏威武雄壮的革命乐曲；第三辆车上载的是锣鼓队，欢庆的锣鼓声震天动地；接着是上书“庆祝四川解放”“庆祝成都解放”的黄字大红旗和许多面五星红旗。在随后的彩车上，英姿勃勃的解放军指战员高举八一军旗，高呼欢庆胜利的口号，演唱着激昂的革命歌曲。随后是各兵种方队：装甲兵团、重炮兵团、步兵团、车队、马队、后勤部队、轻便队……入城队伍长达4公里，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驻地，后面的部队还未动身。

一片欢乐的海洋

30多万成都市民等候在近10公里的入城式线路两侧，夹道欢迎解放军指战员。

簸箕街口左边人行道上，已宣布起义的原成都市市长冷寅东和七八位市里名绅站在欢迎人群的前面，满脸笑容，眼噙泪花，手执五星红旗向着入城的解放军欢呼致意。

在玉带桥东口一带聚集着数百名女工组成的欢迎队伍，齐声高唱女大学生昨晚刚到厂中教的《解放歌》。行进中的解放军听到歌声，顿时也合唱起来。有人唱起了《黄河大合唱》，一声“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立即传来解放军的回唱声。霎时间玉带桥附近顿时群情振奋，歌声连成一片。

春熙路一带是城中商店聚集繁华的地方，各商店的门灯、檐灯，都换成了红色，上面贴着黄色五角星，好似一面面五星红旗在微风中飘荡，与满街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彩旗交映生辉，一片浓厚的节日气氛。四川大学师生、协进中学师生等乘坐精心布置的彩色欢迎专车，尽情欢呼唱歌，翩翩起舞。解放军入城部队的宣传车被欢迎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许多学生和青年递上了日记本、手帕，让战士们签名。

解放军的“轻便队”走过来了，这些年龄较大的解放军指战员，身穿青色短棉衣棉裤，腰插两支系有红绸的手枪，意气风发地行进在市区大道上。欢迎群众高喊：“老游击!武工队！”军民一齐唱起了《游击队之歌》。

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起义师生的欢迎队伍甚为壮观——3000余人分乘50辆大卡车排列在街道两旁，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盛会。他们高唱刚刚学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进中的解放军呐喊助威。

整个入城式用时4个多小时。入夜，各种军民联欢晚会在成都市区各影剧院、公园、茶馆、街头举行，欢快悠扬的歌声此起彼伏，直到东方又铺满朝霞才逐渐散去。虽然大多数市民和解放军是第一次见面，但双方气氛融洽，整座城市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作者系解放军某部军史部研究员)

解放军迅速平息悍匪叛乱

贾晓明

编后拾遗 BIANHOUSHIYI

1949年9月5日，解放军一野部队解放西宁，随后又进驻湟中、大通、湟源等县城。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马步芳集团残部纷纷放下武器，表示愿意投诚。9月10日，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部分指战员经过三天两夜的追赶，“用两条腿追垮了敌人骑兵的四条腿”，将马步芳的骑兵第八旅旅长马英及其部下包围。在一团指战员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马英仅仅抵抗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投降。

解放军受降后，对国民党军低级军官和士兵就地发给路费予以遣散，同时将马英等校级以上军官送往西宁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学习期间，解放军对马英等的管理相当宽松，甚至让他们回家居住。但投降只不过是马英的“缓兵之计”。不久，解放军驻青海的一野部分主力部队奉命调入新疆等地执行任务，马英得到消息后，以“回家居住”为名逃离西宁，召集躲藏在山里为匪的旧部，在青海大通、门源等地公然挑起武装叛乱。

12月5日拂晓，马英率匪众数千人，包围了桥头镇、大通县城等地，并疯狂发动攻击。当时，驻守桥头的是解放军一军三师骑兵营营部和两个骑兵连；驻守大通的是第三师第九团(团部和二营两个连)，敌我力量悬殊。

中共大通县委得到马英发动叛乱的消息后临危不乱，一面组织军民积极准备守城，一面紧急联络西宁，汇报情况。12月5日，第一军军部接到匪情报告后，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迅速主持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首先派三师师长兴中率领七团两个营赶往桥头和大通增援，以解两地之围。傍晚，军部又命令二师六团一营由副团长张祖台率领，炮兵团的一个营由该团副团长阎廷明率领，从西宁迅速赶往桥头镇，负责巩固桥头据点，确保西宁经桥头到大通、门源交通道路的安全。

此时，马英正命令上千匪徒对驻硖门的解放军四连展开围攻。面对来势汹汹的马英土匪，四连战士沉着应战，九团团政委余金龙率领驻大通县城部分战士及时赶到，把四连接回了县城。马英继而指挥匪徒进攻县城，城内解放军奋起抵抗，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协助守城。在解放军指战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并肩奋战下，5日当晚一个匪徒也未能爬上城墙。

与此同时，桥头镇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该镇位于西宁市西北35公里，是一个只有200余户人家的小镇，但地形险要，且有3条公路分别通往西宁、门源、大通。匪首马英深知该镇的重要，因此亲率匪徒发起攻击，攻打解放军三师骑兵营(缺第二连)。匪众占据了桥头南、北山高地，居高临下向解放军射击。解放军战士架起机枪仰射，与敌人隔河对峙。6日，解放军七团和六团增援部队陆续赶到，和守军内外夹击，击毙土匪300余人，俘虏500余人，残匪保护着马英仓皇逃走。

当日下午，六团两个营及炮兵营继续向大通增援。张祖台奉命指挥一个营协同骑兵营留守桥头，以防马英匪众再次反扑。不久，解放军增援部队抵达大通县城，围城叛匪遭到沉重打击后顷刻瓦解。

马英连遭败绩后，于11日黄昏派部分匪徒袭击距桥头10公里的煤窑沟煤矿，企图切断西宁市的燃料供应。解放军桥头守军闻讯后立刻分兵赴援，于13日凌晨两点赶到煤窑沟，全歼该股敌人。

马英以为解放军分兵救援煤窑沟，桥头必定空虚，于是在12日下午亲率600余匪众到达桥头南山阵地，命部下攻山数次，却被解放军守军击退。第二天，解放军一军二师骑兵营赶到，配合桥头部队将马英叛匪彻底击溃。追击中，一名骑兵营战士连发两枪，击毙一个狼狈逃窜的土匪。检查尸体后，从其身上搜出一块重四两九钱的金砖和一个水晶石私章，上面刻着“马英”二字。第二天，解放军从军官训练处调来一名原马步芳部队军官，经他辨认，证实被击毙者正是匪首马英。消息传出后，大通各族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4日，大通县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此次剿匪战斗的捷报。随后，解放军于21日出发，分路进剿门源土匪，次日收复门源县城，匪众叛乱被迅速平息。

吕正操妙计除据点

梁银安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吕正操率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部驰骋冀中平原，积极展开敌后战争，书写了平原抗战中的传奇历史。

1940年初，日军在临城县平汉铁路以西修筑了一条南北封锁沟，并在胶泥沟村建立了据点和炮楼，驻扎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和一个警察所，还有便衣汉奸、密探等。据点里的日伪军经常外出对附近的村庄烧杀抢掠，群众恨之入骨，迫切希望八路军除此祸患。

这年10月中旬，吕正操领导的冀中警备旅从冀南开往太行山区，经过临城时，听取了临城抗日县政府、独立营和保家民团的敌情汇报。为消除敌人对临城西北部的威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吕正操决定，立即拔掉这个据点。

在县独立营和保家民团的配合下，吕正操率警备旅一连除掉了胶泥沟据点日军布置在各村的汉奸密探，严密封锁消息，并化装前往炮楼附近观察敌情，还找到经常为敌人据点搬运物品的老乡了解情况。经调查，吕正操得知，协助日军驻守的伪军中，除排长死心塌地跟随日军外，其他伪军多为被抓的“壮丁”，经常受到日军欺压，于是心生一计——他派警备旅侦察连长携带“慰劳品”前往据点，称是替生病的汉奸前来报告情况。敌人盘问了半天，发现没有破绽，便让侦察连长进了据点。侦察连长进入后送上礼物，又说要请伪军排长到村里“玩上几天”。伪军排长信以为真，就带着几个伪军跟随侦察班长出了炮楼，向村里走来。这伙伪军行至半路，被八路军埋伏人员全数抓获。

按照吕正操的部署，侦察连长除将伪军排长交地方审判外，对被俘的伪军进行了说服教育，在成功将他们策反后立即释放。

当夜，吕正操率领部队秘密接近敌人据点，迅速实施包围。不久，被策反的伪军从里面打开坚固的大门，几十名手持短枪和手榴弹的八路军战士悄悄进入据点，直扑日军营房。里面的日军根本没有防备，武器全都“整齐”地放在一旁，见八路军犹如天降，只得投降。另一个房间的日军军官企图顽抗，被当场击毙。与此同时，伪军也在劝说下放下武器。战斗很快结束，战士们在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敌人据点后，押着俘虏、扛着战利品迅速撤离。

吕正操带领冀中警备旅战士奇袭端掉胶泥沟炮楼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临城各地，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还为这次战斗编写了一首顺口溜：

冀中名将吕正操，途经临城逞英豪；
带领战士除汉奸，打击日寇端碉堡；
军民合力震敌胆，太行山上红旗飘！

新四军张家坊设伏诱敌

孟 玮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43年初，日军对襄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2月，襄南沦陷，国民党守军或逃或降，有的溃散为匪。襄南群众苦不堪言，日夜盼望新四军收复失地。

3月下旬至6月中旬，新四军五师十五旅部队奉命陆续挺进襄南。经过连续作战，不仅消灭了大批敌人，更瓦解、俘虏、收编伪军和土匪4000余人，很快打开了局面。7月，十五旅四十五团挺进至洪湖地区，当地群众奔走相告，热烈欢迎子弟兵的到来。

日伪军得到情报后，企图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扫荡”，将新四军赶出洪湖地区。中共襄河地委派到监(利)沔(阳)地区指导工作的陈秀山同中共监沔县委书记李秉范以及四十五团负责人研究后，决定采取“兵分两路，避实击虚”的战术，在运动战中伺机打击前来“扫荡”的敌人。具体办法是：四十五团副团长曹玉清和李秉范率四十五团三营和“团直”为一路，向洪湖北岸的渔村彭家墩、张家坊一带转进；团参谋长青雄虎率四十五团二营为另一路，向洪湖中间的全墩、中墩转进。

四十五团三营和“团直”到达张家坊后，立即得到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送来的情报：新堤据点的伪军王一鸣部在日军的督促下，将于一两天内出动，乘船进入洪湖“扫荡”新四军，而沔阳方向的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将不会参与此次行动。针对敌人的动向，四十五团立即调整了部署，集中力量打击新堤据点的敌人。

9月5日晚，青雄虎率二营到达中墩，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伪军王一鸣部驻守在这里的先遣排，将这股敌人全部俘虏。经审讯，青雄虎得知王一鸣部主力将于6日一早配合日军进至张家坊。青雄虎立即派人前往张家坊给曹玉清、李秉范送信，同时布置部队迅速修筑工事，设伏拒敌。为诱敌深入，青雄虎特别命令部分战士换上伪军军装，站在中墩“显眼”的地方，手拿日本旗，“恭候”敌人的到来。

6日上午8时许，日伪军乘坐大小渔船300条驶向中墩，见前方挂有日本旗，还有“伪军”招手示意，便大摇大摆地鱼贯而入。日伪军的船驶到张家坊，进入新四军四十五团的伏击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新四军战士从两岸一齐开火，顿时将敌人打得乱作一团、纷纷落水。不一时，敌人就被毙伤350多人，船只纷纷起火。残敌跳水逃命，被新四军沿河“下网捕捞”，包括日军“政务指导官”和伪军中队长在内的60多人成了俘虏，走在最后的王一鸣和少数卫士急忙调转船头逃走。这一仗，四十五团大获全胜，缴获长短枪200多支、轻机枪10挺以及一批军用物资。

张家坊战斗是新四军进入洪湖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声威大振，洪湖周边大小据点的日伪军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出来活动。

张公干智助游击队

王贞勤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47年5月的一天上午，驻扎在鲁西南鄄城县的国民党整编六十八师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接到一份紧急命令，要他火速带部队前去“围剿”正在箕山集整训的共产党地方武装鄄城县大队，并且要他在接到命令起直到任务结束也“不许任何人离队”。

其实，张公干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多年来他不仅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还保护了我方的不少干部同志，因此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此前不久，他曾接到指令，要他带兵去距离鄄城西南不远的一个小村抓捕共产党干部。他随即以去厕所为借口外出，将这一情报悄悄告诉了地下党联络员、团部传令兵范毅。由于范毅及时将情报火速传递了出去，敌人扑了一个空。

张公干心中十分清楚：看来敌人不仅已经有所察觉，而且已经在自己身边安插了监视者。为了稳住团部其他人，张公干一面不动声色地集合部队，一面紧张思考着对策。

三五六团出了鄄城，往箕山集方向进发。在距离箕山集还有5公里的时候，张公干令部队停止前进，把连排军官集合在一起进行“战前动员”：“弟兄们，消灭了游击队，我请你们吃顿饭。不过……”张公干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大家拼命归拼命，也要注意点枪子儿！我这个团就这两千来人，你们要是给我打没了，我还当谁的团长去?咱们丑话说到前头，谁的部队打少了打没了，谁的连排长也就不用干了！”

有几个连排长本来为了立功请赏，还很“踊跃”，也没考虑过士兵的死活，现在听团长这么一说，顿时心里都“犯嘀咕”了。队伍随后继续前进，却走得越来越慢，尤其担任先锋的几个排，更是磨蹭着不肯快走。张公干便命令团部的几个副官、参谋全部靠前“督军”。这些副官、参谋怕中埋伏，就依仗权势，硬是走在队伍正中间，惹得不少士兵破口大骂。

队伍好不容易走到距离箕山集还有两三公里的地方，前方传来了枪声。张公干命令队伍停下。不久，前方报告说：好像有共产党埋伏，所以开枪。张公干心中暗笑。

箕山集终于到了，张公干命所部官兵把全村搜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抓到一个共产党。有的官兵逼问老百姓把游击队藏到哪里去了?老百姓回答说：“你们离着好几里远就枪炮齐鸣，人家早转移了！”

1947年9月13日，张公干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并控制住几个国民党死硬分子后，带领全团官兵宣布起义，鄄城也随之解放。

后来，张公干先后担任解放军师长、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新乡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64年离休，2003年在新乡逝世，享年95岁。